

奋进时代呼唤诗词创造



主持人：胡妍妍(本报编辑)

对话人：谢冕(诗歌评论家、北京大学教授)
吉狄马加(诗人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)
范致行(诗歌爱好者、微信公众号“读首诗再睡觉”创办人)

核心阅读

诗歌和人类心灵最近,越是生活节奏加快,越需要诗歌。诗歌传播需要媒体发挥作用,对普通读者做诗歌“科普”,解答普通人对诗的疑惑,帮助大家更好地进入一首诗,让最好的诗歌走近更多的人

“诗言志”这一中国诗歌传统,并没有因白话新诗出现而中断,相反获得现代更新。这里的“志”是为民生、为社会、为民族振兴、为国家自立自强的大志向,这是诗与读者之间最内在最深刻的联系

“为什么没有大诗人”,这样的追问背后是对文艺高峰的期盼。如何在与时代的激荡中锤炼精品,拿出匹配时代、标记文艺创造新高度的大作品,这是今天诗人回避不了的命题

从个体通向大众,重建诗词与时代社会的有机联系

主持人:“让最好的诗歌走近更多人”,其实是在期许诗歌重建、加强与读者的联系。很长一段时间里,都能听到对当代诗歌写作圈子化、远离读者、自说自话的指责。重建与读者、与时代社会的有机联系,对诗歌来说为什么重要?

谢冕:回到新诗源头来看,新诗诞生在国家内忧外患、整个社会要求自立自强大背景下,从最初发起就是要和社会现实、人民生活状态发生联系,所以当时明确提出“为人生”的主张。新诗以言文相谐的语言之新,以新思想、新观念等现代潮流顺利融入诗中的思想之新,与大众建立紧密联系。可以说,“诗言志”这一中国诗歌传统,并没有因白话新诗出现而中断,相反,在郭沫若、艾青等诗人那里获得英气勃发的现代更新。这里的“志”是为民生、为社会、为民族振兴、为国家自立自强的大志向,一百年来我们都在这样奋争。这是诗与读者之间最内在最深刻的联系。

吉狄马加:归根结底,诗人创造的是两个世界,一是用词语构筑的世界,一是通过艺术创造试图实现的理想世界,这两个世界相互关联、密不可分。诗歌作用不仅仅存在于诗歌本身,还应该为提升人类道德和精神高度发挥作用。法国诗人路易·阿拉贡在评价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:是这个人教会我如何让诗歌真正进入公众和人民。这样说,并不是否认诗歌在精神和美学上的独立价值,但是,让诗歌和社会发生更广泛的联系,在任何时代都是必要的。

主持人:几乎所有文艺都有基于个体、面向大众的问题,但诗歌表现得尤为明显。一方面极为强调独特的个人体验,一方面又最容易引起广泛共情、共鸣,以诗歌表达“撬动”社会现实和大众情感。

吉狄马加:如果只有细腻的爱情诗,没有表现拉丁美洲浑厚灵魂的那个诗歌巨构,聂鲁达便不是那个诗歌巨人。真正一流的诗人首先一定是思想家,有对时代大潮和时代本质的深刻认识,其次还得是融合个人情感、个体生命体验与时代精神进行艺术呈现的高手。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为人称道,他对人民的热爱、对社会历史的责任是和他的浪漫主义美学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。身处战争和革命年代的诗人艾青、马雅可夫斯基、帕斯捷尔纳克等,他们的作品不仅记录时代,而且不是一般性记录,而是真正高水平的艺术的记录:他们在个人生活、个体生命经验和时代经验,社会现实以及民族精神、人类精神之间找到了最佳结合点。

谢冕:现在一些诗人表现小小的悲欢、小小的愿望、小小的心境,把大众遗忘了,把更大的关怀遗忘了。诗歌通过表达自我通向大众,如若不能引起大众共鸣,又有什么意义呢?我常常说,第一是境界,而后才是艺术。没有境界,再好的艺术也没有用。什么是境界?就是为大众表达心声,就是家国情怀,就是社会兴衰匹夫有责。这不是标语口号,大诗人莫不如此。“死去元知万事空,但悲不见九州同”,这就是境界;“王师北定中原日,家祭无忘告乃翁”,这就是情怀。

范致行:时代在变,诗歌通向读者的方式也在变。我们做诗歌微信公众号,其实是在变歌传播接受层面引入用户思维,把读者想象成用户,将用户培养成读者。所以得考虑用户场景,考虑固定推送时段读者的状态、心境,让传播“应时应景”。归根结底,还是通道问题,给读者一个进入诗的通道。诗和生活息息相关。这种生活性也促使我们走“读诗”的道路,通过读和听,重新发现诗歌的音乐性,发现诗歌的动听动人之处。

捕捉提炼时代精神,大时代呼唤大诗人

主持人:谈论诗歌,作品是根本,诗人是决定性主体。从诗人诗作角度,如何评价当下诗歌创作得失?

吉狄马加:诗歌非常难翻译,但诗歌交流恰恰是国际文化交流的活跃领域。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,诗歌是顶尖的语言艺术。世界范围内大家关注诗歌,正是关注不同民族的表达方式和语言创造,包括这种语言体现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。从世界范围内来看,一个普遍问题是同质化写作,经济全球化造成日常生活雷同,诗人关注的问题比较接近,反映到创作中就是“标新立异”很难;另一个问题是经验和表达碎片化,缺少总体性关怀。当下有很多年轻诗人起点很高,综合素质不错,阅读面也广,具有世界性文化眼光,需要提升的是对时代、对民族文化的深入认识和独特表达。

谢冕:新诗发展到今天,语言精致成熟,写诗的人也很多,而且大多写得不错,但是没有出大诗人、大诗歌。让人眼前一亮、传诵广泛的好诗太少,这个时代还有许多能引起我们内心风暴的东西,尚未得到充分表现。钟嵘《诗品》评价一个诗人时说“犹恨其儿女情多,风云气少”,因此将其归入下品。这种评价对当下诗歌创作也有一定适用性——身处大时代,诗人当写出恢宏的风云之气。

主持人:“为什么没有大诗人”,这样的追问背后是对文艺高峰的期盼。如何在时代的激荡中锤炼精品,拿出匹配时代、标记文艺创造新高度的大作品,这是今天诗人回避不了的命题。

范致行: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,今天大量诗人都是非职业诗人,诗人身份掩盖在其他职业身份之下。这既带来诗歌精彩纷呈的灵感与活力,也给诗歌进一步打磨精进造成困难,要知道,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之外保持诗写状态很不容易。而且,非职业写作往往带来诗歌交流的缺乏。古往今来许多事例表明,诗人与诗人充分交流碰撞中才会产生一个时代的强力诗人。

谢冕:标记时代文艺高度的应该是作品对时代精神的表现与把握。发表于上世纪50年代的公刘《西盟的早晨》,以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表达迎接崭新时代到来的心情。这样的诗很天真纯净,但却表达了时代精神。

诗人应该是最敏感的,敏感地捕捉时代精神,并且通过诗歌艺术凝练出来,体现出来。批评家评得很多,但评到要紧的地方很少,看得很多,但没有选出好诗来。这里既有眼界问题,也有引导问题。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站在中国诗歌高度,看出整个发展动向的批评家,像别林斯基那样能够指出什么代表俄罗斯声音的批评家。

吉狄马加:虽然诗歌欣赏见仁见智,但是无论从批评、研究,从诗歌史还是从诗歌创作角度来说,都应该有基本的美学标准,有一定的评价共识,这样才能发挥引导作用。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”,过去百年,中国新诗深刻介入现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,在巨大社会变革中描绘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,塑造中国人新的审美感觉,凝聚中国人的精神;现在和未来,诗歌理应随时代变化而变化,在人民的创造中创造,从当代中国人鲜活的生命历程中汲取力量与美感,寻找中国经验新的美学表达方式,创造新的辉煌。



学习语言文字不仅是掌握一种工具,更是在构建、营造一个人的精神家园,教语文课不能重分轻德,引导学生学习其中的人文思想,才是最为可贵的

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有些事情是非做不可的。青少年正处在心灵发育关键期,最重要的教育是“点亮生命的灯火”,树民族精神之根、爱国主义之魂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能够点亮生命火种的“火种”,是滋润身心成长优质的琼浆。

我做教师时,在三个方面持之以恒地对青少年加以引导:

第一件事,是培养青少年对祖国语言文字的“骨肉亲情”。有些人张扬工具理性,很多孩子仅仅把学语文看做文字的“排列组合”,文科真正价值被忽视。一个民族要生存发展,文化是不变的根基,作为母语的语言文字又是文化的根基,是民族生活的百科全书,蕴含着我们民族的睿智、民族的思维方式。我们有曹操《观沧海》“日月之行,若出其中。星汉灿烂,若出其里”那样宏观到宇宙的思维方式;我们也有聚焦一点的点睛之笔如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,一个“闹”字就把蜜蜂、蝴蝶都唤来了。中国文字是具象的、灵活的、富有弹性的。社会发展,新事物诞生,象形的中国文字自有创造空间。一个“车”字旁几乎能囊括所有“车”的种类、部件,从牛车、马车,一下子到现代的电车、汽车、火车……

作为语文老师,我一直认为古诗文的阅读背诵很重要。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就自编校本教材,让学生们熟读背诵古诗文。这些古诗文涉及范围很广,反映我们民族文化方方面面,有山川壮丽、四季风光也有世态人情,将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通过语言结晶并表达出来。小学阶段孩子还小,像唱山歌一样的诵读也能体会到形、音、意之美。形美以悦目,有时雍容华贵、有时挺拔潇洒,形于笔墨,为人们带来快乐;音美以悦耳,汉语有多个声调,自有其他语言没有的音韵感;意美以悦心,少年儿童通过阅读,就能逐渐步入中华文化宝库,体会到其中的璀璨丰厚、博大精深。

学习语言文字不仅是掌握一种工具,更是在构建、营造一个人的精神家园;对语言文字的认同,关系到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。阅读、背诵古诗文,目的是让学生从小熟悉母语、热爱母语,真正感受到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言与民族文化血肉相连,由此与我们的语言文字建立“骨肉亲情”。

第二件事,是引领青少年从亘古长青的经典中吸取思想结晶和智慧。优秀经典经历无数次实践的淘洗、筛选,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。它们活在时间深处,也活在当下眼前:就像一条鱼,既游在春秋战国的河里,也游在我们当代生活的水中。比如孔子阐述“忠恕之道”中的恕道,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,要求你眼里有别人,自己不想做的事情,不能强行要求别人去做,是中华传统文化中“和”的思想体现。

教语文课不能只管“知识点”、重分轻德,引导学生学习其中的人文思想,才是最为可贵的。曾子说:“士不可以不弘毅;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,不亦重乎?死而后已,不亦远乎?”在当时,知识分子不可不刚强、不能没有韧劲,因为要实现“仁”的理想,任务很重、道路很远,一辈子也做不完。两千多年后的今天,我们依然能创造性地转化、创造性地使用它。梁启超先生曾讲,“人生于天地之间,各有责任。如负责任者,大丈夫之始也;行负责任者,大丈夫之终也”。要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,并做到知行合一。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,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,让有悠久

于漪

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在当代、在未来更加辉煌,从民族、国家到个人,同样“任重而道远”,青年朋友们同样要志在弘毅,同样要意志坚强、抱负远大。

第三件事,是重视榜样的力量。孩子成长需要榜样,以什么样的人为偶像,关系到人生道路的选择。我非常重视先圣先贤的榜样力量,通过鲜活形象传达中华文化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精神,传达再困难的情况下都能坚持奋斗的精神品性。比如,屈原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,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陆游“僵卧孤村”却“尚思为国戍轮台”,做梦都是“铁马冰河入梦来”。作为中华民族子孙,我们应该感到骄傲和自豪。如果学生能够学习这样的榜样、从小在心中树立这样的偶像,必然胸有大天地、大格局。

用中华文化的火种点亮孩子们生命的灯火,就是要从小立民族精神之根、树爱国主义之魂,把个人学习、成长、命运与民族复兴、祖国强盛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做到这一点,他就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,就一定“放眼全世界”同时站稳“中国立场”,既为我们的祖国做贡献,也有雄心壮志为人类做贡献。

(本报记者姜泓冰采访整理)

于漪,生于1929年,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教育系,现任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,著有《于漪语文教育论集》等。1978年成为全国首批语文特级教师,荣获全国教书育人楷模、全国三八红旗手等多个称号。2018年12月入选党中央、国务院表彰的改革先锋。



制图:蔡华伟